

乡村精英回嵌何以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基于贵州省 S 村的案例分析

●王辉 陈嘉怡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激活内生发展动力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精英由城市向乡村的流动有助于激活内生动能,进一步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但现有研究对其转化机理缺乏系统性阐释。本文以贵州省 S 村为案例,整合嵌入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深度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受到城乡推拉力和个体特征的影响选择回嵌村庄,具体通过资本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的途径回嵌。三重嵌入合力推动乡村的创新性变革、内外部联动以及乡域一体化,进而释放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传导性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产生。本文揭示了内生发展动能在精英回嵌行为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间发挥传导作用,延伸了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本土化解释链条,并拓展了嵌入性理论研究的互动性视野,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发。

关键词 乡村精英回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城乡融合发展 新内生发展 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26)01-0090-12

DOI:10.16149/j.cnki.23-1523.20251128.001

1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①。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所带来的现实困阻依然制约着城乡融合进程,亟须解决人、地、钱要素的深层次流动与配置问题^②。作为“出自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的乡村精英或新乡贤^③,兼具城市和生活经验与社会资本,在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乡村精英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基于多种考量选择返乡,将个人发展置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画卷。回归后的精英成为内外部主体之间协作与互联的桥梁^④。乡村精英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由“城市向乡村”流动并激活乡村内生发展的过程被界定为“回嵌”^⑤。

学界关注到乡村精英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作用^⑥,多侧重于嵌入方式、嵌入策略研究^⑦,或将其置于乡土社会中多种复合权威的情境下来探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⑧,却鲜有对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深入系统研究。究其原因,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要素、多环节的复杂系统。它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利用村集体资源发展多元化产业,实现资产增值和集体增收,具有“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⑨,是兼具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功能的现代公有制经济形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是优化乡村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方式,又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有效手段。故此,研究乡村精英回嵌如何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研究不足和实践状况,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乡村精英回嵌乡村发展的动因是什么?通过哪些途径回嵌?乡村精英回嵌何以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本文在对贵州省 S 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嵌入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剖析乡

收稿日期:2025-03-08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重点项目(24GZZD26)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NDYB84)

重庆大学中央高校经费项目(2024CDJJKZK05)

作者简介:王辉(1984-),男,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治理、社会政策, wanghuihongda@cqu.edu.cn;陈嘉怡(2001-),女,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社会政策。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www.scio.gov.cn/zdgz/jj/202407/t20240722_855895.html。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content_6754061.htm。

村精英回嵌释放内生发展动能的作用过程及其带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创新在于揭示了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尤其是以内生发展动能为接点所构成的传导机制,有助于以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来推进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本土创新,并增进对回嵌途径互动关系的理解。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回顾

2.1.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双重困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内容,还是引领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乡村治理层面,村民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自主治理和资源开发利用^[9]。在乡村产业层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集体领办、创办、合办的方式,发展多元产业业态^[10]。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受限于制度性困局和行动性困局。制度性困局是指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地方陷入改革的形式逻辑^[11],出现大量“挂牌”的“空心村”。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从法律层面获取了市场主体身份,但是与其他市场主体仍然存在业务的重叠与竞争,需要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12]。行动性困局是指利益相关者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动缺失和行动失灵。一方面,伴随城市化而来的乡村脱域化和原子化,使得乡村社会缺乏可联结的有效主体^[13],更间接弱化了集体意识和地方认同感^[14],最终难以达成村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尚未建立具备高市场吸引力的激励机制,经营人才缺乏的问题突出^[15]。在此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通常由村两委一把手兼任,其多重身份所隐含的“缺位”“错位”“越位”可能引致集体资产流失^[16]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失灵。此外,新型农村集体经经常以社区福利主义为导向,成员享受当前利益而不愿承担长期义务^[17],导致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2.1.2 乡村精英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能空间

本文论及的乡村精英是指有情怀、有经验、有团队、有资本、有身份,且能影响乡村政治经济生态并为之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18]。其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优势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精英依托社会资本进行有效动员。乡村精英拥有关系、信任等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动员社会

网络中的资源,形塑村民对集体价值追求的自觉意识^[19],从而达成集体行动承诺^[20],扩大动员规模。另一方面,乡村精英是村庄发展的重要桥梁。乡村精英自古便处于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网络的双轨政治之间^[21],通常凭借“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身份^[22],对集体经济进行发展规划,并联结协调多主体。因此,精英的这种制度性参与还被视为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支点^[23]。

综上所述,学界论述捕捉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困局成因,以及乡村精英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能空间。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缺口:在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上,鲜有研究关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精英回嵌乡村的途径及其互动关系以及其之于乡村发展的复合效益;在研究的深度上,关于精英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研究处于浅表层,虽然有学者捕捉到精英在其中发挥的整合力量、衔接资源的作用^[24],但对“精英如何促进内生发展动能的转化以及内生发展动能如何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和传导机理”尚缺乏深入研究。故此,本文借助典型案例研究,以厘清乡村精英的多维回嵌途径及其互动关系,并对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制进行系统阐释,进而回答如何破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双重困境。

2.2 理论基础

2.2.1 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理论最初被用于分析经济与社会内在联系^[25],格兰诺维特将其拓展至社会结构的研究,并提出经济活动嵌于社会网络中^[26],而后该理论被用于阐释乡村发展、国家治理等相关研究问题^[27]。乡村精英兼具内外生属性,通过互动与其他主体和环境建立联系,将外部资源带回乡村,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这一过程体现了回嵌的核心内涵,即乡村精英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链接,促进人、地、钱等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与配置。

2.2.2 新内生发展理论

新内生发展理论旨在突破“发展二元论”的桎梏,指出发展既要根植地方,又要与外部接轨^[28],并强调内外部资源和网络的联动^[29]。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和自下而上的乡村内生动能交互作用,以城带乡以工补农,促进人、地、钱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和融合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的变革和创新,这与新内生发展具有相通之处。

2.2.3 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分析框架

整合嵌入性理论和新内生发展理论两大理论视角,以探究乡村精英回嵌何以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适配性和创新性。就适配性而言,嵌入性理论的内核在于力量介入,乡村精英回嵌有助于促进外部资源和内生动能的有效衔接与合理转换,而新内生发展理论则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内外联动的视角。因此,嵌入性理论的运用能够补充新内生发展理论中内生动能转化的要件。二者结合,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考察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就创新性而言,传统的内生发展研究多以资源、参与、认同为核心要素展开论述,重点关注内外合力的作用,而精英回嵌是释放要素活力的复杂过程。二者结合,不仅能够有效回应如何串联内外部主体,还为破除地域性发展难题提供创新思路,这也与西方背景下的内生发展有所差异。故而在中国场景下运用上述两种理论,构建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见图1),有助于创新本土化的理论解释维度,使其更符合乡村振兴的实际演进历程。

乡村精英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回嵌村庄,根据精英回嵌的作用特征,将其回嵌的途径概括为:资本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精英作为人力资本重返村庄,将在城市打拼积累的经济资本输入村庄内部,提供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即资本嵌入。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精英具有特殊的城乡关联性,根植于乡村内外部关系网络中,能够成为衔接二者的纽带,即关系嵌入。乡村精英依托正式组织架构实现权力整合和资源调配,即组织嵌入。

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是在整合多要素基础上的复杂性过程机制的理论推演。首先,乡村精英通过三种回嵌途径,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核心要素。精英在推进集体产权变革的基础上,构建内外部主体联动与发展的通道,并依托基层党组织的统合式引领突破行政村区划限制^[30],推进乡域一体化。其次,内生发展动能释放后,其作为传导接点,进一步补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件。清晰顺畅的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产生相应的制度优势,推动市场化经营,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农村集体经济联动的网络结构是在城乡要素流动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其中形成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经营管理和联农带农体制机制,能够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跨村域的抱团式发展既拓展了市场空间,又延伸了产业边界,有助于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最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形成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三重效益,对相关行动者产生正向反馈作用。

3 研究设计与案例介绍

3.1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具备理论探索 and 理论构建的功能,能够从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洞见。由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如何通过精英回嵌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内生发展,属于已有文献尚未深入探讨的内容以及案例研究中“怎么样”问题的范畴,因此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

选取贵州省S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乡村精英贡献突出。S村精英具有深厚的家乡情怀和高尚的品德,将经济社会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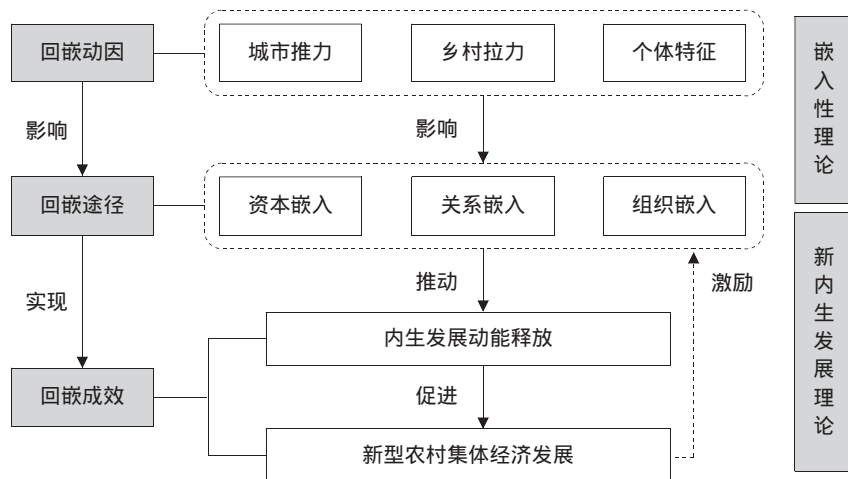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本投入村庄,为乡村发展增添活力,既收获群众的认同,又得到各级政府表彰。其二,新内生发展特征鲜明。S村在实施产权制度变革的前提下,以多方主体参与作为主线,并突破边界阻碍,实现整体发展。其三,发展成果显著。S村从偏远贫困的民族村庄一跃成为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村民人均收入增长近30倍,村集体收入实现从无到有再到壮大,特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现已入选国家“产业融合”旅游扶贫案例。

数据资料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对S村的精英代表、致富村民、监测户和前乡镇党委书记等群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乡村发展相关信息。其二,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补充材料。笔者在2023年2月至2025年8月,多次实地走访S村,观察村民生产生活情况、相关组织的运作情况和乡村精英所开展的工作,以及通过线上追踪调研保证材料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其三,通过S村村委会获得文件材料,主要包括农村“三变”改革、监测户信息、财政补贴等资料。整体访谈时长近40小时,形成文字资料近16万字。总之,通过饱和式调研,形成体系化的经验逻辑。

3.2 S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S村位于贵州省L市P乡,是布依族、彝族、苗族三大民族聚居的民族村庄。该村共有村民502户,1462人,耕地1326亩,水田897.3亩,林地3817亩。2012年前,S村以传统农业为主要产业,村民年人均收入仅700余元,集体经济尚无,且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严重缺乏,生态环境恶劣。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乡村“空心化”现象突出。为了摆脱村庄的贫困面貌,以TZX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实施了系列举措。经过探索期、发展期和突破期三个阶段,S村不仅实现了脱贫攻坚的目标,还成为了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村庄。

精英TZX受城乡推拉力量的影响,为实现自身价值追求,选择回嵌家乡。他将合伙对象锁定在与其私交甚好且具备经济实力的同村精英中,通过情理利并举的方式,成功动员4位在外精英携资本返乡,协助其推进村集体经济改革谋划工作。在“三变”改革基本完成后,TZX作为主要股东投资建设旅游景区,其他精英顺势发展养殖、餐饮、民宿等产业,并发挥示范作用,引导村民转型发展餐饮、民宿、商铺、游乐场,甚至是摊贩等农文旅融合业态,吸引更多外出精英回嵌,进一步释放乡村经济活力。回嵌精英搭建乡村产业舞台后,通过以商招商的方式,引入一批外来市场主体,形成完善的农文旅产业链。回嵌精英在不同阶段通过资本投入、示范引领与关系动员,构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内生动力。S村部分精英情况见表1。

3.2.1 探索期:初具雏形(2012—2014年)

2012年初,在外打拼多年的精英TZX受到国家政策感召和个人回馈桑梓的价值驱使,决心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TZX返乡后,先发动村内其他精英共同成立合作社,并以股份制的形式整合村内资金和资源。2012年底,共计流转土地2000余亩。2013年,针对资源“小、散、乱”的问题,TZX邀请专家团队对S村及其周边村庄的资源进行评估,再与乡镇政府协商并成立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和联村党委。TZX担任联村党委书记后,沿袭2012年股份合作的思路,将村集体所属的生态林、水域等共计8.5万亩自然资源入股旅游公司,提出“一村一景”文旅业规划,剩余的土地用以种植刺梨等高价值经济作物。在探索期,S村积极推进资源整合,并搭建起乡村旅游业和山地特色农业体系。

3.2.2 发展期:遍地开花(2015—2018年)

首先,改革经验被多省市学习扩散。2015年,乡村精英所引领的系列措施被当地政府总结为“三

表1 S村部分精英信息

乡村精英	身份要素	精英类型	外出与否	相关贡献
TZX	曾从事煤炭、房产开发,现为联村党委书记、旅游公司董事长	经济精英	外出后返乡	乡村核心精英,返乡后推进合作社、旅游公司设立,投资上亿元,并率先提出股权资源流转措施
TYC	曾从事轻工产业,现为村支书、联村党委副书记	政治精英	外出后返乡	合作社发起人之一,早期投入60余万,负责整体统筹和沟通协调工作
GY	曾从事房地产行业,现为养殖场场主	经济精英	外出后返乡	合作社发起人之一,早期投入近80万,负责思想动员工作
TZK	曾从事煤炭行业,现为县城餐饮店店主	经济精英	外出后返乡	合作社发起人之一,早期投入近30万,负责思想动员工作
TMZ	曾为小学教师,工会主席	文化精英	留乡	合作社发起人之一,促使乡村精英带头人返乡的关键人物

变”改革经验,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认可和推荐,多省市官员前往学习取经。其次,产业链逐渐成型。2015年,娘娘山园区、银湖广场、江源洞景区等景点相继建成,游客量达22万人次,S村村民实现村集体固定分红1.1万元。2016年,联村村集体将3817亩的生态林和320亩湿地用于温泉别墅休闲养生和生态观光旅游项目开发,联村的村集体总资产包括60万现金和部分股权,联村村民持合作社73%股份,S村人均年收入近1.3万元。2017年,娘娘山园区被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综合收入达到1500万元,S村人均年收入约为1.4万元。2019年,S村入选贵州第一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1.8万元。最后,多家企业投资,如利群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公司入股3500万元到园区的温泉养生项目。在发展期,随着多方关注和外来资源介入,产业规模逐渐扩大,村民收入显著提升。

3.2.3 突破期 焕发新生机(2019年至今)

2019年后,旅游景区责令关停,发展陷入停滞。2020年,S村村集体资产为242.8万元。2021年,贵州宏财公司和旅游公司合并成立娘娘山温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泉公司”),曾在大理经营多年民宿的村民LK返乡承包温泉公司,打造面向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民宿经济”,使得乡村发展再次焕

发活力。2021年,S村成为中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十大案例之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万元。2023年,S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万元,年集体经济平均收益近18万元,并辐射带动7个周边村庄人均收入达1.1万元。此外,村庄其他方面也呈现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沪昆高速将于2026年与S村附近的村庄接通,有助于扩大客源市场;另一方面,精英群体所提出的村庄整体发展规划颇具吸引力,包括打造“睡眠之乡”、开发民族体验项目等,不少企业前来洽谈合作。在突破期,乡村产业发展情势已经逐渐好转,显露新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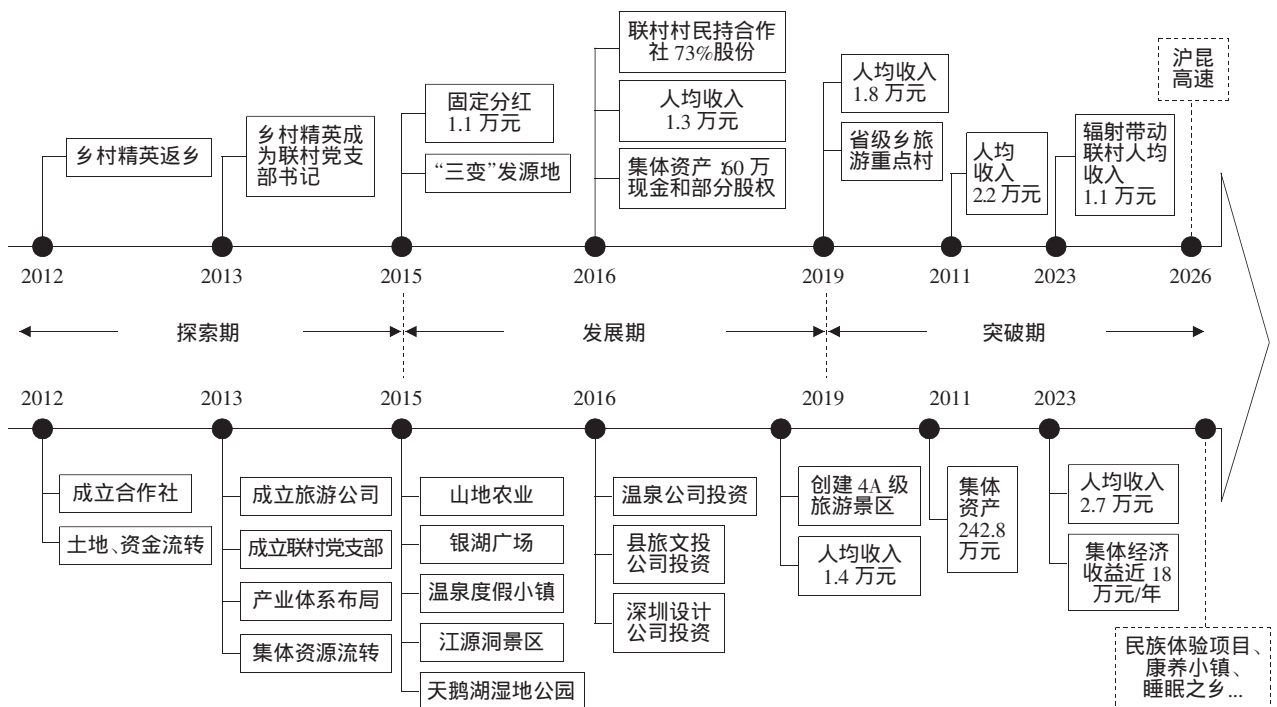
在探索阶段,S村寻求资源流转的有效路径,探索出“三变”的经验做法,并明确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思路;在发展阶段,各联村的产业规划落地,村民以此为契机开展经营活动,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突破阶段,及时引进有力的市场主体开发新业态,并拓展具有前景优势的业态,从而突破发展困境。S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如图2所示。

4 乡村精英回嵌的动因与途径

4.1 乡村精英的回嵌动因

4.1.1 城市推力 扎根困难与发展受限

城市对于乡村精英而言既有拉力,还有推力。



注:该图中的实线部分是已经历的,虚线部分是未来规划和展望。

图2 S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融合推进,乡村精英流动的倾向性受推拉力量对比变化影响^[31]。首先,乡村精英虽然在城市拼搏获取了金钱,但是受到在城市根基不深厚、受教育水平有限等因素钳制,难以进一步获取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社会流动出现天花板效应。其次,现代城市社区属于陌生人社会,深层次情感思想联系少,自幼成长于乡土熟人社会的精英在城市生活容易产生漂泊感。最后,精英 TZX、TZK、GY 等早期的致富行业多集中于煤炭开采、房地产开发等,在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背景下,这些产业的可持续性减弱,发展空间受限。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所提供的平台,为乡村精英重新定位社会角色并突破城市发展瓶颈创造了契机。在城市发展受限与农村集体经济的机会结构对照下,回嵌乡村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考虑选项。

4.1.2 乡村拉力:情感牵引与政策机会

首先,乡土是精英身份归属的根源,其中父辈资源、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是其在乡村重建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基础^[20]。精英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整合社会资本,有助于强化自身影响力。其次,在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吸引外出精英回归乡村。国发〔2012〕2号文件从财税、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人才、对口支援等多个方面,提出支持贵州加快发展的突破性意见^①,因此当地乡村两级干部积极游说支持乡村精英 TZX 返乡创业。最后,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和农业现代化,乡村精英有机会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农村合作社等新型经济形态实现自身价值。乡村拉力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情感因素和政策因素转化为真实的利益,吸引精英回嵌。

4.1.3 个体特征:价值追求与责任能力

首先,精英幼时亲历家乡生活的艰难,于是让家乡“富起来”一度成为精英的人生目标。精英离家打拼后仍然得到村里人的帮助与支持,比如夜里多户村民的灯火照亮了精英 TZX 送母安葬故土的道路,加深了精英对家乡的情感。当精英在城市有所成就后,回望贫困的家乡面貌,更进一步激发乡村精英带领家乡脱贫致富的行动。其次,集体经济的发展有效回应社会期待。村干部的不作为与乱作为

引发群众不满,村民说服精英 TYC 返乡并推选其担任村支书。TYC 上任后,通过落实集体经济项目为群众增收,其价值追求与集体治理需求相吻合^[32]。最后,精英的能力优势因集体经济而被放大。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在城市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诸多优势,若以个体企业形式回流易产生排斥反应,但是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嵌入能够实现共赢。

4.2 乡村精英的回嵌途径

4.2.1 资本嵌入: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同作用

乡村精英携资返乡有助于应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资本难题。乡村精英作为有人脉的人力资本,能借助专家力量廓清村庄发展思路,从而依据资源禀赋明确山地特色农业和生态文旅两大产业发展方向。

“当时我们特意请了勘察队的,发现这边的地质和气候适合种刺梨、猕猴桃这些经济作物,而且有大片的湿地,很适合搞点生态旅游啥的。”(访谈记录 S 村核心精英、联村党委书记 TZX20231230^②)

为落实上述规划,精英 TZX 提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闲散资金入股的方式,整合集体资源。为进一步弥合发展的资金缺口,精英 TYC、GY、TZK 等将在外积累的经济资本作为股金,出资 30~80 万元不等。精英 TZX 则累计投入约 4.5 亿元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整体打造,其产业以酒店和旅游公司为主,辐射带动乡村的山地农业和旅游业,以个人产业投资为村庄搭建起“个体经营-集体经营”相互嵌合的发展格局,兼顾个体收益与集体增益。

4.2.2 关系嵌入:基于关系网络激发主体活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置于持续运转的关系网络中,乡村精英作为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能够针对利益相关者的核心需求,采取差异化策略,凝聚社会、政府、市场等多方力量。起初,钱地入股的举措让许多村民望而却步,精英群体作为致富先锋,凭借情感纽带和号召力,通过多轮游说消解村民的固有观念。

“我当时就觉得地都不在自己手头了,万一吃不饱饭了咋整?”(访谈记录 村民 WLK20231231)

此外,精英 TZX 将资金借予村民入股,并作出“如果没有盈利,不需要还钱”的承诺,以致村民吃下了“定心丸”,纷纷参与其中。精英 TZX 是响应乡镇政府动员而返乡,故而二者间联系较为紧密。同时,精英能否带动村庄发展也关系到省级政府的指标能否达成,于是政府通过投入公共物品、项目资

①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https://www.gov.cn/zwqk/2012-01/16/content_2045519.htm。

②访谈记录编码规则:受访者身份信息+受访者姓名汉语拼音首字母+访谈时间(八位数字,前四位为年份,后四位为日期,如 20231230 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

金和出台优惠政策,支撑精英行动。为创造必要的市场条件,精英借助经商时期建立的商业联系,结合产业发展的向好趋势,吸引温泉公司、深圳设计公司等企业参与投资经营。

4.2.3 组织嵌入:依托党建组织身份推进联村工作

中国村庄面临“分得过散、统得无力”的困境,需依托有力的组织载体加以整合。规模化集体经济发展所需的山水林田湖草资源散落多个行政村庄,且村与村的联系松散,抑制着集体行动能力和组织效能。乡村精英与乡镇政府商讨决定以党建引领抱团式发展,以S村党支部为核心,联合周边7个村庄和1个合作社党支部,成立联村党委。由精英TZX担任联村党委书记,精英TYC担任联村党委副书记。他们依托组织身份,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通过召开多次会议,确定联村党委的组织管理制度,最终形成乡镇党委、联村党委、村党组织三级领导体制,为后续的跨村联动奠定组织架构基础。同时,乡村精英根据资源的挖掘情况和前期发展经验,提出联村资源整合思路,并完成统筹协调工作,以实现产业的统一规划与布局。

4.2.4 三重嵌入的互动关系

资本、关系、组织的三重嵌入是精英回嵌的途径,也是精英作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其间存在叠加赋能和逆向回馈的动态联结关系(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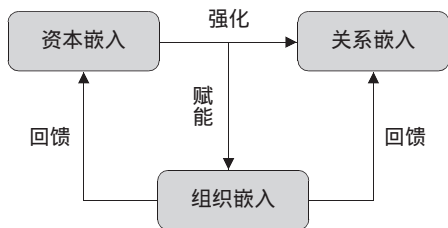


图3 三重嵌入的互动关系

一是资本嵌入强化关系嵌入,有助于增强内外主体力量。资本投入量与村民参与度成正比,乡村精英帮助村庄的资本投入行为可视为一种“馈赠”,接受赠予的村民基于道德约束和情感激励,形成参与乡村建设等“回报”行为^[33]。二是资本嵌入和关系嵌入共同为组织嵌入赋能,促进组织效能释放。两位精英初任联村党委书记和副书记时,乡镇政府为乡村精英赋权,增强精英的话语权与引领力。同时,乡村精英通过资本嵌入和关系嵌入,依托经济实力和村庄声望,充分发挥统筹作用,破除管理阻碍。三是组织嵌入回馈关系嵌入和资本嵌入,进一步巩固乡村精英的资本存量和社会关系网络。

精英TZX在推进联村工作过程中,其能力全方位提升,成为更优质的人力资本。与此同时,精英的关系网络也由村庄层拓展至乡域层,并通过组织嵌入,深化乡域内村庄联系。总而言之,由于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因素颇多,且分布于三种回嵌途径中,不同维度内的因素可能存在交叠。因此,本文从系统性的角度切入,以三重嵌入的合力作用为起点探讨如何激活内生发展动能。

5 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制

5.1 乡村精英回嵌推动乡村内生发展动能释放

5.1.1 乡村精英回嵌激活集体产权的创新性变革

资源禀赋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资源利用的本质是资源的产权转让与配置,因此建立具有明晰化和激励性特征的产权制度有助于实现内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乡村地域广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程度受村庄地形、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乡村精英作为人力资本回嵌后,因地制宜确定变革模式。S村位于贵州山区,自然资源丰厚,但是村组众多且分散,导致资源利用困难,集体资产匮乏。同时,村庄老龄化和空心化加剧,发展空间受限。针对当时的村情村貌,精英组织建立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通过成员资格界定、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和产权权能明确等,将资源资金入股,实现产权财富化,进而扩展村民增收致富渠道。此外,能否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还与乡村治理有效与否密切相关^[34]。S村及周边村庄都属于国家级贫困村,限期脱贫是基层政府的重要任务。精英采取的产权变革做法成效显著,故而政府将其上升至制度层面,总结为“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盘活了村集体资源,提升了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5.1.2 乡村精英回嵌实现内外部主体联动

内外部主体联动是乡村迈向内生发展的前提^[35]。地处偏远且建立在宗族血缘根脉上的村庄,其内部观念封闭滞后、发展劣势突出,导致外部主体下乡意愿低、下乡难度大,因此内外部主体间联结不畅。要打通二者的关联通道,强化利益联结是核心。一方面,为达成共同行动,精英投资修路,打破村庄与外界的物理屏障,并通过行动示范,转变村民观念,使其能够接纳外部主体;另一方面,随着精英组织打造的产业体系逐步成型,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政府的支持力度。至此,内外部主

体联结关系趋于紧密。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内外部主体联动还需在利益逻辑中嵌入情感因素。在脱贫攻坚时期,道路修建是首要任务,也是情感实践的载体。为啃下“烂路”这块硬骨头,乡镇党委书记和精英,长期与村民、工程队同吃同住,共同解决难题。这增强了主体间的情感认同与合作黏性,精英与政府进一步将情感治理技术融入乡土秩序建构中,凝聚共同体意识。

5.1.3 乡村精英回嵌推进乡域一体化进程

内生发展绝非一枝独秀,而是多点开花,尤其针对“小、散、乱”的中国农村,更需要关注跨越村庄的因素。行政村具有自治和行政的双重功能,能够有效平衡利益关系,因此,全国各地多将行政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基本单元并以此为界。但是,随着城乡融合进程推进,集体业态的复杂性和规模性需求增强,逐渐超越单一村庄的地理边界和行政范围^[26]。S村所属乡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和高位统筹优势,依托联村党委,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基本单元上升至乡镇层面,以弥合边界不一致的裂隙。具体体现在乡村精英通过组织嵌入和关系嵌入,发挥统筹带动作用,推进跨村域的资源整合,实现空间层面的村庄协同。在此基础上,联村党委打造“村村一产业,寨寨有风光”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产业的有机联合,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联村村民和村集体也能够从中获得入股流转资源的利润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普惠性,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整体内生发展动能。乡村精英回嵌促进内生发展动能释放的过程如图4所示。

5.2 内生动能释放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5.2.1 产权变革奠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基础

“三变”改革是集体经济组织在自主探索中解决现实问题的地方经验经由中央政府吸纳而转化

为国家政策的农村改革探索,为集体经济组织创新实现形式和运营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其一,引入企业制度以推进集体经济规范运行^[34]。“产权清楚、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三变”改革将推进股份合作制作为主线,成立合作社和旅游公司。其中,合作社进行资源资产的确权流转,旅游公司除开发合作社所汇集的资源以外,还招贤纳士成立管理团队,负责统一运营。而后,贵州宏财公司和旅游公司按照4:6的比例占股成立温泉公司,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政经分离”,使得集体经济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市场竞争。

其二,盘活资源资产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变革以明晰产权边界为前提,将原本较少甚至不能创造经济利益的资源入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资源的比较优势,选取富有竞争力的集体产业项目,并通过市场化开发运营,将资源转化为具备较高经济价值的资产。S村的湿地资源起初处于“沉睡状态”,将其入股合作社后,由旅游公司打造为湿地公园,并开发索道项目吸引游客,利润额大幅提升。经过上述项目投资开发、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化运营等环节,旅游公司的资产由注册的1亿元增长至8.89亿元,实现经济体量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其三,股权量化激励以提升管理效率。变革后,村民的入股资金作为合作社统一使用的本金,且股份精确到每人每户。这就意味着村民所获的集体经济收益从福利导向转化为股份导向^[12],湿地公园等项目的盈利便会转变为股金分红和股权收益,有助于提升村民参与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此外,集体资产虽归集体所有,但仅能由个别经营人才进行管理。为解决经营人才动力不足和道德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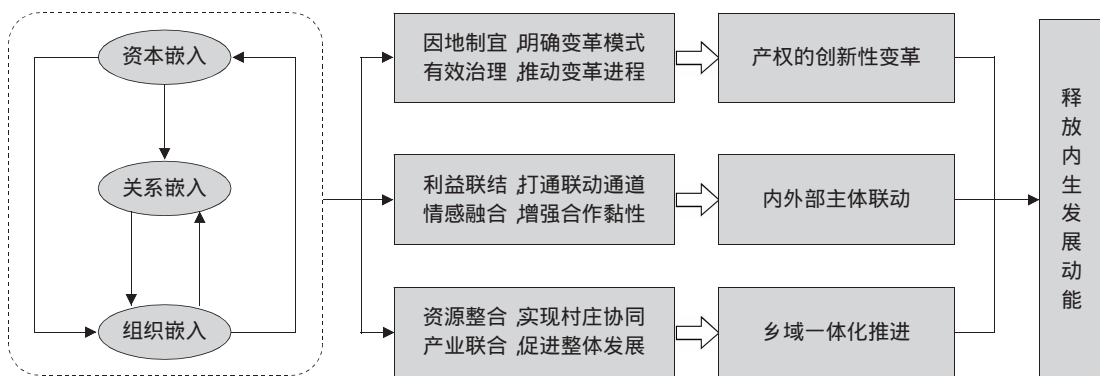


图4 乡村精英回嵌促进内生发展动能释放的过程

问题,变革通过向经营人才分享剩余索取权、参与集体收益分配,激励其充分发挥才能,从而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效率。

5.2.2 主体联动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效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如果仅依赖内部主体和外部主体其中一方的力量,易陷入理想化危机或失去自主性。因此,内外部主体的聚合效能才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其一,资源互嵌以形成互惠共生的产业生态。S村拥有温泉资源,由于缺乏开发的资金和能力,便将资源入股,由旅游公司出资开凿温泉并建造20幢温泉小屋,但是受到专业经营能力不足的影响,上述资产被闲置。贵州某酒店公司的高管LK返乡后捕捉到此项目的发展前景并选择承包,引进公司资源和经营理念,所打造的“民宿经济”一度爆火。内外部主体通过资源交换和聚合,合作黏性增强,从而形成一致性目标和联合行动^[37],拓展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兴业态。

其二,业务联动以释放集体经济的发展潜力。内外部主体在协商互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各主体以擅长的业务板块弥合集体项目所不足的部分。村民提供服务和劳动,合作社和旅游公司负责农文旅资源开发和招商引资,外部业主针对已投项目进行经营管理和品牌包装,政府除了提供资金、政策支持外,还通过各大媒体宣传推广,使得农文旅产业项目的发展潜力不断增强。村民也由此拓展了视野与能力,把握住集体经济发展所衍生的商机。在景区流量的带动下,部分村民承租近景区的店铺,经营超市和餐饮业务,村内还掀起新修民宿浪潮,2025年已有6栋民宿在建造中,原有的民宿业态规模持续扩张。

其三,再造团结以增强集体经济的发展韧性。共享性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要义^[17],而各参与主体的目标诉求有所差异,需处理好积累与分配的问题。S村以创造村社共同利益为基础,在村集体、村民、企业等主体间建立互利型、劳资型和股权型的利益关系网络。合作社与旅游公司就近就地招工,满足当地村民的就业需求,增加其劳务收入,也解决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村民作为股份持有者,能够获得租金和分红的双重收益。其中,分红资金的使用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落地,不仅保障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属性,还增强了集体经济的责任感与凝聚力,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长期支持。

5.2.3 乡域一体化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效应

过去,农村集体经济以集体经济组织实体为边界^[38],而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其配套制度落实,边界延伸至产权权属和集体经济活动的范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产权归属的封闭性和经营活动的开放性等特征^[39]。乡村精英顺势提出以联村党委为载体,推进乡域范围内的抱团发展。

其一,资源跨域整合以拓展市场空间。村庄小型化和空心化是乡村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导致可用资源有限,尤其是在面对市场竞争和资本下乡时,乡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将被削弱。然而,乡村产业发展嵌套在大范围的区域经济网络中,其中资源分布与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固然形成区域间发展的张力,但这种张力并非不可调和,反而蕴藏了合作的可能性。乡域一体化将乡镇作为集体经济治理的基本单元,联合多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跨村联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其他经济组织联营等模式。由此,以更大的组织规模整合资源,进而扩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度参与市场化。

其二,乡域整体规划以推动规模化经营。乡域一体化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既要处理因村庄固有边界引发的历史遗留问题,又要从发展模式、收益分配及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规划,故而需要政府统筹协调^[40]。由政府整合财政资金和政策资源,并借助精英的社会性力量,以党建促联建,拓展组织框架,将多个村庄的资源整合至统一的治理体系。通过以商招商的方式,引入技术、资本等现代要素,对联村资源资产进行专业性开发和市场化运营,使得产业选择和经营形式有所增加,有助于提高产业业态、生产要素方面的融合程度,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其三,强村带弱村以增强乡村共富。在以单个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背景下,条件优势村更易吸纳资金、项目等有限资源,而条件劣势村则会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加剧村与村之间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联村党委沿用“三变”改革的股份合作制,不仅为联村村庄增加收益共享机会,还通过资源开发使得各村集体分别拥有了六车河峡谷、天生桥“一桥三洞”奇观、天山飞瀑等多项集体经营性资产。此外,经由乡域一体化还建立起兼具公平和效率的收益分配机制,能够让条件劣势村共享联村发展红利,促进村域的均衡发展,实现乡村共富。

5.3 小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与效益循环

乡村精英回嵌、内生发展动能释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三者具有紧密的衔接与递进关系,其传导机制为乡村精英回嵌释放乡村内生发展动能,进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性发展。在依托政治、行政、市场和社会等力量的基础上,乡村精英通过资本嵌入、关系嵌入和组织嵌入的方式回嵌村庄,三重嵌入合力激活内生发展动能。具体体现在精英发挥创造性引领作用,激活集体产权变革;发挥中介作用,实现内外部要素的双向互构;借助联村党委赋予的组织身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进乡域一体化进程。同时,内生发展动能作为精英回嵌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间的重要节点,发挥传导作用,突破集体经济面临的双重困局。一方面,产权变革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进行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村民和村集体从中获益。加之乡域一体化推进,变革扩散至联建村庄,更多村庄成立合作社并运行。这有助于突破集体经济的制度性困局,为集体经济塑造鲜活的灵魂。另一方面,内外部主体在资源互嵌和业务联动的过程中,深化利益与情感联结,形成发展共同体,并依托联村党委,在乡域范围内促成集体行动发生,增强

共富效应。其中,重点针对经营人才建立利益赋予和激励机制,以激发经营人才活力。这破除了集体经济的行动性困局,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会产生特定的效益。在经济层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托资源优势进行自主经营和业态培育,并以合作的方式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收致富效应随之增强。其中,精英作为重要股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长使其获得分红等经济性收益。在社会层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得村民在资源控制过程中增强主观能动性,还有助于优化利益联结关系,打造联系更为紧密的发展共同体,而精英带领村民致富,也能够提高其声望与地位。在政治层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减轻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压力,还可能产生晋升机会,比如精英由此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荣誉表彰。综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激励精英进一步回嵌村庄。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制见图5。

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合嵌入性视角和新内生发展视角,对案例抽丝剥茧地层层解构,探视乡村精英回嵌助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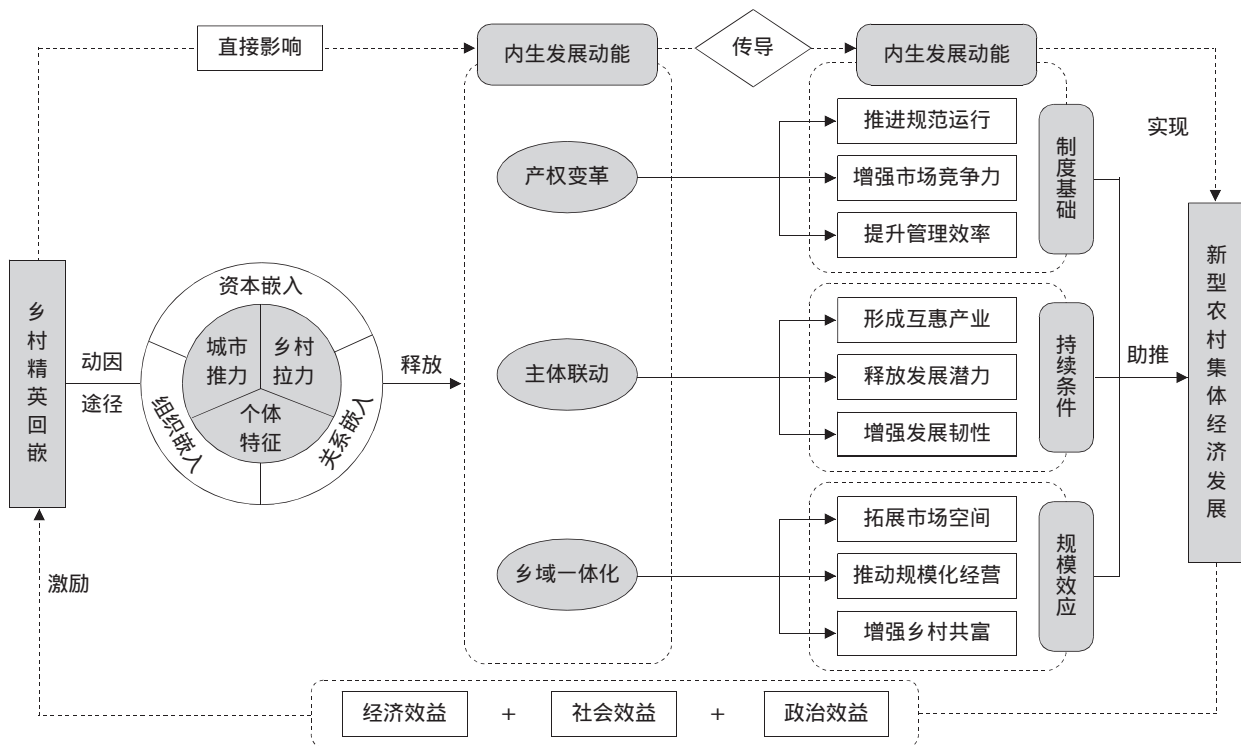


图5 乡村精英回嵌助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乡村精英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回嵌村庄,回嵌的合力作用促进乡村内生发展动能的释放,进而传导性地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效发展,由此带来的三重效益也对乡村精英产生反馈激励作用。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炼出“乡村精英回嵌-乡村内生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传导机理。传导通常用于描述国家意志等经由多层级政府和接点组织传递并落实的过程^[21]。文中的“传导”有别于“国家-社会”的传导方式,而是与中微观视角下市场行动和乡村发展间的传导机制^[35]相似。乡村精英作为起点,作用于乡村的产权变革、主体联动、乡域一体化等内生发展动能的释放,从而破除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性困局和行动性困局,传导性激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持续条件和规模效益等发展要件。

二是立足中国特色的村庄社会情况,提出乡域一体化概念,既是对跨村党建实践形态的抽象概括,也是对新内生发展理论的本土性弥合。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以更高的政治势能实现跨区域的深度整合,这与联村党建的内涵基本相符。但是,区域一体化所强调的空间范围与中国行政村联合的局域性覆盖范围不相匹配,故用“乡域一体化”阐释乡域内多个行政村通过建立统一的沟通、领导组织,实现抱团式发展的过程。

三是提炼归纳乡村精英的回嵌途径,并探索其间的互动关系与复合作用,拓展了嵌入性理论的动态视野。单一嵌入聚焦的重点不同,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而探讨嵌入的互动,有助于明确如何强化不同维度的嵌入。此外,三重嵌入并非一一对应内生发展的具体环节,而是某一维度蕴含内生发展所需的多种因素。因此,需要统合回嵌效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作用。

6.2 延伸讨论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精英回嵌固然能够促进城乡要素间双向流动甚至是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然而,还需辩证看待乡村精英回嵌的作用,仅依靠精英的力量尚不足以完整承担乡村产业振兴的战略任务,还应当考虑特定情境对精英产生的影响。乡村精英回嵌需要得到政治、行政、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加持和系统增能,以量变促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质变。如果缺少上述力量,精英回嵌是否能够激活乡村的发展活力还

有待商榷。随着村庄自主能力的提升,乡村精英还需适时转变自身角色,持续创造价值。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举措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精英是对此进行调适的实践者和推动者,精英主导的底色较为浓烈。随着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推广,精英的角色逐渐向协调者转变。这主要是由于乡村社会与外部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二者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需要乡村精英在其间持续对接以寻求平衡。此外,精英在乡村中的象征意义、情感联系和身份认同是“三变”改革所搭建的共享体系和联村党委等跨村资源整合平台所无法复制的。这就意味着机制设计和组织建设只是对精英主导作用的系统性替代,伴随而来的应是精英角色和功能的转变。因此,乡村精英回嵌是阶段性的动态演化过程,需要保留其回嵌和适度退出的空间,以适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从而破除依赖性和断层化的双重困境。

本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个案选择难以超越地域性特征的约束,选取案例呈现“精英治村”的典型特征,该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乡村精英存在特定依赖性。此外,由于案例村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只能隐约窥见精英主导作用的弱化趋势。未来需要开展追踪调研,进一步探讨发展后期精英角色的转变和柔性回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 [1] 冯晓龙,周晓时,司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5(1):175-183.
- [2] 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光明日报,2014-08-20(06).
- [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民,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4] 周立,王彩虹.由双重脱嵌到双重回嵌: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分析[J].行政管理改革,2019(6):44-53.
- [5] 彭宗峰.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一种理解框架重构的视角[J].求实,2024(3):96-108.
- [6] 原超.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A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2):57-66.
- [7] 栗伊萱,杨晓婷,毛寿龙.嵌入式统合:新时代干部下乡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的实践逻辑[J].公共管理学报,2024,21(4):137-150.
- [8] 钟伟军,陶青青.压力下的权威拓展:基层政府如何塑造非正式治理资源?——基于浙江省W镇“仲规依”的案例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2):128-139.
- [9] 王辉,金子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治理和社会连带机制——浙江何斯路村草根休闲合作社案例分析[J].中国农

- 村经济, 2022(7): 18-37.
- [10] 陈荣卓, 车一頓. 利益聚合与行动协同: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何以建构?——来自武汉市星光村的经验观察[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10): 65-73.
- [11] 徐月华, 隋宜珂, 王益民. 化“土”成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如何通过制度资源编助推产业发展[J/OL]. 南开管理评论, 1-29[2025-11-15]. <https://link.cnki.net/urlid/12.1288.f.2025.0708.1000.002>.
- [12] 孔祥智. 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产权清晰+制度激励”理论框架的研究[J]. 经济纵横, 2020(7): 32-41.
- [13] 文军, 刘雨航. 迈向新内生时代: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5): 142-149.
- [14] 谭海波, 王中正. 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基于湖南省油溪桥村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8): 84-101.
- [15] 胡凌啸, 舒文, 周应恒. 产权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能及深化方向[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2): 87-97.
- [16] 张浩, 冯淑怡, 曲福田. “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2): 81-94.
- [17] 赵黎.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8): 60-83.
- [18] 胡鹏辉, 高继波. 新乡贤: 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20-29.
- [19] 李祖佩, 钟涨宝.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社集体: 实践境遇与再造路径——治理视角下对四类发展典型村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 19(4): 101-112.
- [20] 顾绚, 李唯为, 李丁. 合村并居背景下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广汉市G镇“三长共治”的治理实践[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4): 127-136.
- [21] 陈荣卓, 金静. 中国乡村治理试验的双轨逻辑及链接机理——2019—2024年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经验证据[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8): 93-108.
- [22] 徐勇.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 代理人与当家人[J]. 二十一世纪, 1997(8): 151-158.
- [23] 徐凤增, 袁威, 徐月华. 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1, 37(12): 134-151.
- [24] 龚丽兰, 郝永君. 培育“新乡贤”: 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6): 59-76.
- [25] [匈]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刘阳, 冯钢,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26]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 社会与经济: 信任、权力与制度[M]. 王水雄, 罗家德,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27] [美]尼尔·弗雷格斯坦. 市场的结构: 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 甄志宏,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8] QU M, ZOLLET S. Neo-Endogenous Revitalisation: Enhanc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hrough Art Tourism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97: 105-114.
- [29] BOSWORTH G, ANNIBAL L, CARROLL T et al.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J]. Sociologia Ruralis, 2016, 56(3): 427-449.
- [30] 马华, 石文杰. 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3(2): 90-98.
- [31] 刘祖云, 姜姝. “城归”: 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2): 43-52.
- [32] 陈斌. 组织嵌入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机理探究——基于S村的个案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4): 72-79.
- [33]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 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关系网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4] 芦千文, 杨义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84-103.
- [35] 刘玉焕, 彭洋, 尹珏林. 非遗赋能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本土创业的纵向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5, 41(5): 117-132.
- [36] 许汉泽.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联村发展”——对陕南H县“三联”经验的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1): 106-120.
- [37] 苑鹏. “公司+合作社+农户”下的四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探析——从农户福利改善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4): 71-78.
- [38] 刘梦琴.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的路径选择[J]. 农村经济, 2011(2): 92-96.
- [39] 高强, 崔文超. 从封闭到开放: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5): 2-12.
- [40] 齐皓天, 张迈, 韩玉萍, 等. 乡镇“全域三变”条件劣势村集体经济的共富之路——基于重庆市城口县岚天乡的个案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5(4): 47-63.

(8)How the Re-Embedding of Rural Elit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S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Wang Hui, Chen Jiayi ·90·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26)01-0090-EA

Abstract : Reinforc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s a crucial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mobility of rural elites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helps to generat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here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lack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This paper takes Village S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nd integrates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o analyze in depth the process mechanisms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elites, influenced by both urban-rural push-and-pull factors and thei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choose to re-embedding villages. They achieve this through capital embeddednes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The coupling effects of embeddedness drive innovative changes in villages, promo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s, and township domain integration. In turn, releasing endogenous momentum, which indirectly boost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growth and enhance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benefits. The paper reveals the transmission role of endogenous momentum between elites re-embed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xtending the localiz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ory. These findings off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rticle Type :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 Rural Elites Re-Embedd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9)How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between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Miao Qing, Lin Jing ·10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26)01-0102-EA

Abstract : Under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bureaucratic rigidity and capacity disembedd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s have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with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capacity complementarity", pointing out that institutional flexibility expands the initiative spac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hrough a decentralization mechanism, while capacity complementarity broadens their resource base by leveraging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resource endowments. The dynamic coupling of these two factors forms four types of collaboration modes, they are "strategic embedding type", "contractual agency type", "loose expedient type", and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type". Based on four comparative cases, the study reveals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emergency collaboration